

# 从两个“历史决议”看中国共产党政治民主的发展

陈红军

(星海音乐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 对两个“历史决议”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文章试图从政治学的视角,对两个“历史决议”的文本进行一个全新的解读,通过对两个“历史决议”形成过程和内容的比较,勾勒出中国共产党政治民主的发展历程,揭示出政治民主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概念所表现出来的民主基本原则的共性与不同时期、不同社会、不同制度下的个性特征。

**[关键词]** “历史决议”; 政治民主原则; 政治民主发展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8)03-0054-04

在中国共产党80多年奋斗历程中,曾经集中开展过两次对党的历史的学习和总结,形成了两个“历史决议”,第一次是从延安整风开始,经过六届七中全会形成《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二次实际上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过十一届六中全会形成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两个“历史决议”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文试图从“两个决议”在政治民主这一特定视角上的比较研究,说明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坚持民主的原则是不变的,但实现政治民主的形式、表达政治民主的话语及其政治民主的层次又有显著的不同。

## 一 两个“历史决议”起草的过程体现了民主的原则

两个“历史决议”从起草到最后决议通过,都充分体现了民主作为一种“原则”、“价值”和“工作方式”在政治行为过程中的作用。但作为具体的、历史的民主,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水平和层次不同。为了便于对两个“历史决议”的起草情况进行分析比较,作者把它们的形成过程作了简要的概括。

第一个“历史决议”的起草过程:

1941年王稼祥“历史草案”——1944年任弼时“决议草案初稿”(至少3次修改)——胡乔木重新起草“决议草案”,任弼时3次修改——张闻天重新构思并多次修改——毛泽东7次修改“决议草案”提交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并原则通过——继续修改并在七届一中全会正式刊印——编入《毛选》时修订。

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过程:

1979年叶剑英国庆讲话随之准备起草“决议”——起草组成立胡乔木提出“决议”初步设想——1980年为刘少奇平反;听取各界意见并提出提纲——邓小平“三点意见”修改提纲——1980年5月“决议”初稿形成——胡乔木亲自起草“文

革”一段并形成第二稿——1980年9月再次完成完整决议稿(未定稿)——1980年10月高级干部讨论稿4000人大讨论——胡乔木“初步意见”12条——陈云修改意见及与邓力群的四次谈话——1981年3月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40人讨论——1981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再度讨论——1981年6月在京民主党派、无党派及政协老同志座谈——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并一致通过。

通对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两个“历史决议”的一些共同点:

(一)两个“历史决议”起草的时间长。六届七中全会一共开了十一个月(1944年5月—1945年4月),是我党历史上时间延续最长的一次会议。其重要任务就是重新起草“历史决议”。其实早在1941年9月,毛泽东就提出要总结1932年—1935年党的路线,并成立了“组织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委员会”委托王稼祥起草了文件《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委员会领导路线的结论(草案)》(即“历史草案”)。“历史草案”也成为六届七中全会重新起草“历史决议”的蓝本。这样一来,第一个“历史决议”的起草时间就可以追溯至1941年。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始于1979年叶剑英的国庆讲话,到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历时近2年。

(二)参与两个“历史决议”编写、修改和讨论的人员众多。两个“历史决议”都成立了专门的编写团队,为完成第一个“历史决议”的编写,中央书记处会议先后成立了“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和“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并抽调王稼祥、任弼时等参与过党内许多重大事件,熟悉党的发展历史,理论分析能力强的同志参与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编写是在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同志主持,集中了新华社、《人民日报》社、《解放军报》社和档案部门的许多优秀人员组成“历史决议起草小组”,并由参加过

**[收稿日期]** 2008-03-06

**[作者简介]** 陈红军(1977-),男,湖南衡阳人,星海音乐学院教师。

第一个“历史决议”起草的胡乔木同志具体负责。第一个“历史决议”先后由4人重新起草或构思,又经他们反复修改形成四个不同名称的决议版本。<sup>[1]</sup>据直接参与第一个“历史决议”编写的胡乔木同志回忆,“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和参加六届七中全会的同志们对“决议”草案进行过多次讨论和修改,毛泽东同志也从1945年春开始对“决议”的“抄清件”进行了7次修改。<sup>[2]</sup>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期间,经过多少次修改已无从统计,各种形式和规模的讨论与意见征求也难以计数。单是邓小平同志关于对“历史决议”文稿的撰写和修改意见的讲话就有十六、七次。围绕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讨论就更多,单是大规模的讨论就有好几次,如1980年的4000人大讨论,1981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大讨论和民主党派、无党派及政协老同志座谈等。

(三)两个“历史决议”要处理的关系复杂。两个“历史决议”都是对过去一段时间党的重大历史问题的评价,对党内一些同志尤其是领导同志的功过是非的判断。如何既实事求是又恰如其分,在弄清事实的前提下团结同志,是两个“历史决议”要面对的棘手问题。毛泽东在主持第一个“历史决议”的起草时就多次强调:“对于任何问题应采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sup>[3]</sup>如对于党的六大、上海临时中央是否合法、党内的宗派问题等当时大家争论较多的问题,逐一进行了实事求是、很有说服力的分析。他说:“我认为(党内宗派)经过几次分化是没有了。……这样的估计才符合事实,利于全党的团结。”<sup>[4]</sup>第一个“历史决议”对历史上的大是大非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得到了原先犯错误的同志的一致拥护。博古说:“这个决议是在原则上很严格,而态度对我们犯错误的人是很温和的,并表示:愿意接受这个决议作为改造自己的起点。”<sup>[5]</sup>邓小平在第二个“历史决议”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的问题上,不仅明确地提出了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马克思主义原则,而且进一步具体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评价历史人物的一整套方法,解决了正确评价毛泽东的一系列重大关键问题。他多次强调“对于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sup>[6]</sup>他主张在“决议”起草和修改时要坚持三条总的原则:第一,确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核心一条。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sup>[7]</sup>他还主张在总结中坚持“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楚不可能,也不必要。”<sup>[8]</sup>要想在短时期内把所有的问题都搞清楚是不可能的,勉强解决还可能造成新的错案。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达尔在他的经典之作《论民主》中强调一个社会发展政治民主所要达到的五项标准:(1)有效的参与;(2)投票的平等;(3)充分的知情;(4)对议程的最终控制;(5)成年人的公民资格。我们暂且不管这些归纳是否全

面与合理,至少它对于政治民主的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两个“历史决议”在起草的过程中也充分满足了作为“工作方式”的“参与”、“投票”、“知情”、“控制”和作为“原则”、“价值”的“公民资格”的要求。长时间、多专家的酝酿起草、广泛的意见征求和讨论、谨慎科学的评价和判断是两个“历史决议”的共同特点。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所说:“我们现在学会了谨慎这一条,搞了一个历史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写过多少次,经过三翻四复的研究,经过多少双眼睛看。但有中央委员会几十双眼睛看不行,而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没有大家提意见,我一个人就写不出这样完备的文件。”<sup>[9]</sup>“历史决议”形成中集体的参与,平等的协商,反复的讨论,多次的修改,最后大会的表决通过,无一不体现出中国共产党民主的气氛。相对第一个“历史决议”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的时间更长、参与起草的人员更多、处理问题的艺术性更高,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不仅征求了党内意见,还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广大民众广泛磋商,此举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政治民主的层次更高,范围更广。张闻天描述民主时说:“民主是大多数人的专政,是依靠而且完全依靠大多数群众的信任。最自由的,最广泛的,最有力量的吸引一切民众参加政权,没有任何隐藏,没有任何秘密,没有广告,也没有形式”。<sup>[10]</sup>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两个“历史决议”无疑是这样一种民主的真实写照。

## 二 两个“历史决议”的内容体现了政治民主的发展

### (一)两个“历史决议”中民主词汇的比较

| 出现频率(次) | 第一个“历史决议” | 第二个“历史决议” |
|---------|-----------|-----------|
| 民主      | 47        | 46        |
| 人民      | 51        | 147       |
| 自由      | 5         | 2         |
| 平等      | 0         | 4         |
| 博爱      | 0         | 0         |
| 社会主义    | 8         | 92        |
| 人民民主专政  | 0         | 6         |
| 民主集中制   | 3         | 4         |
| 集体领导    | 0         | 4         |
| 群众路线    | 0         | 5         |

与资产阶级时刻挂在嘴边的“自由”、“平等”、“博爱”相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民主并没有用华丽的词藻来修饰。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一词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中国共产党新型生产关系下更高类型的民主即“人民民主”。但在不同历史时期“人民”这一概念的内涵不尽相同。第一个“历史决议”形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人农民为主体而有其他社会阶层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sup>[11]</sup>这一性质决定了当时人民的范畴包括无产阶级、农

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第二个“历史决议”形成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人民”的概念有着最大的包容性,除了各种严重的刑事犯罪者以外,当代中国人都在“人民”之中。由此可见第二个“历史决议”所体现的民主范围比第一个“历史决议”要更广;“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等语词在第二个“历史决议”中出现频率的增加,说明第二个“历史决议”形成时我国政治民主类型更高(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民主);“群众路线”、“集体领导”等词汇的出现,说明第二个“历史决议”政治民主的制度更趋完善。

## (二)两个“历史决议”对犯错误同志的评价比较

陈独秀是中共历史上颇受争议的领导人,两个“历史决议”中他都是以右倾投降主义的姿态出现的。第一个“历史决议”中陈独秀的名字一共出现了8次,分别表述为:“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企图分裂党和实行叛党的托洛茨基陈独秀派和罗章龙、张国焘等的反革命行为”、“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投降主义者,这时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逐渐变成了取消主义者”、“陈独秀投降主义”、“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和三个“陈独秀主义”。<sup>[12]</sup>陈独秀因“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sup>[13]</sup>而致大革命失败,事后又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取消革命运动,而且还同反动的托洛茨基分子相结合,成立了反党的小组织,最后被驱逐出党并堕落成反革命”。<sup>[14]</sup>这些评价,过于强调陈独秀个人的责任,认为其“堕落成反革命”也与历史事实不符。但是在第二个“历史决议”中对陈独秀及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做出了更加理性的解释:“党当时还比较幼稚,又处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下,致使革命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已经发展到六万多党员的党只剩下一万多党员”。<sup>[15]</sup>今天学术界在对陈独秀的认识上有了更多的不同声音,如对陈独秀右倾错误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陈独秀的民主思想与爱国主义思想等都有较多的研究成果,也给了我们研究两个“历史决议”更多的启示。

第一个“历史决议”中的李立三与第二个“历史决议”中的华国锋在很多方面有相似之处。比如两者都是在革命或建设时局出现有利变动时走上党的最高领导岗位,两者执政时间非常短暂,并且都滑向了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深渊。两个“历史决议”分别对两者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批判,措词却大相径庭。首先,李立三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产生了错误的路线和主义(“立三路线”和“李立三主义”)。第一个“历史决议”指出:立三同志拒绝了许多同志的正确批评和建议,并在党内强调的反对所谓右倾,在反右倾的口号下错误地打击了党内不同意他的主张的干部,因而又发展了党内的宗派主义。<sup>[16]</sup>而华国锋只是在指导思想继续犯了“左”的错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其次,李立三在大干(武装起义)的同时,还“污蔑”了毛泽东的正确思想,而华国锋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在动员

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方面也起了积极作用。由此可见,在不同历史时期大致相同的错误也会有不同的性质定论。

马克思指出:“我们越是能够摆脱个人的好恶,就越能更好地判断这些事实本身及其后果。”<sup>[17]</sup>两个“历史决议”对于犯错误同志的批判,从出发点来讲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但两者在措辞和对历史事件的定性上是有差别的,第一个“历史决议”更加强调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同犯错误同志的斗争,“决议”中“主义”一词出现了219次,几乎是党内有过错误的同志就会形成一个“主义”,如“冒险主义”、“命令主义”、“盲动主义”、“山头主义”等。这一现象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的政治语言习惯,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这一时期我党在政治民主发展上的不足,与毛泽东在1957年提出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还有一定的差距。当然从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内容来看,我党在政治民主发展上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共产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常识与锻炼”<sup>[18]</sup>的事实,我们从对于两个“历史决议”的政治语言分析中可以看出,如把党的优势建立在权力而不是在群众的拥护上,对于党内犯错误的同志也没有能够实事求是的辩证分析错误,民主集中制过多的强调了集中领导等。如果说战时我党不得不采取相对集中的政治制度,那么在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后的中国共产党,很清醒地认识到政治民主对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性。第二个“历史决议”便是我们总结政治民主的经验教训,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又一经典文献。

政治民主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是在古老民主含义基础上被赋予了新内涵的一个政治范畴。两个“历史决议”投射出来的政治民主的内涵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民主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是特定的上层建筑,它以特定的社会经济为基础,从属于社会生产关系。“民主是个政治概念,属于上层建筑范畴。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抽象的超阶段的民主,也没有什么绝对的民主。民主的发展总是同一定的阶级利益、经济基础和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民主应该适合自己的国情”。<sup>[19]</sup>第二,民主是具体的、历史的,而不是抽象的、绝对的。“民主这个‘概念’……每次都随着人民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它没有帮助我们前进一步。照我的意见,应该这样说:无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也需要民主的形式,然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种形式和一切政治形式一样,只是一种手段”。<sup>[20]</sup>第三,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民主常常体现为一种原则、一种价值或一种工作方式。但是,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政治意义上,民主首先是一种国家制度和国家形式。由此,我们可以把民主定义为在特定的经济关系和利益关系基础上,保障公民权利得到平等实现的政治形式。在阶级社会中,它表现为以特定阶级利益为基础,平等实现统治阶级成员政治权利的国家形式。

## [参考文献]

- [1] 4个版本分别是:王稼祥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委员会领导路线的结论(草案)》;任弼时起草的《检讨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胡乔木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张闻天构思毛泽东修改后命名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
- [2] [5][9]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05-330.321.324.
- [3]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38.95.
- [6] [7][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83.74-75.4.
- [8]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94.148.
- [10] 张闻天.张闻天文集(第1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393.
- [11] [12][13][14][16]中共党史文献研究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508.494-534.491.493.496.
- [1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Z].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532.
- [18]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0.
- [19]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Z].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748-1749.
- [2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61.

## The Analysis on CPC'S Political Democracy Development from the Two Historical Resolution

CHEN Hong-jun

(Xi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two resolutions' drafting courses and text contents as cut-in point and describes the historical line of CPC'S political democracy development in the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It also tries to reveal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n the political democracy in different period and different society.

**Key words:** "historical resolution"; political democracy principle; political democracy development

## 古典小说结构的精深剖析

### ——评朱迪光教授的《信仰·母题·叙事》

朱迪光教授的《信仰·母题·叙事》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模式进行了深入探讨,是中国古典小说新探索丛书中的代表性著作。论著分为三部分,在对信仰的渊源、母题的产生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探索了二者对古典小说叙事模式的影响。可以说,该书立论新颖独到,在论述中时见匠心。就笔者所见,其成就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从繁芜的叙事中抽绎出了一个简明、独到的见解:“民间信仰与叙述母题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内核与形式的关系(信仰为内核,叙述母题为形式)。”“‘叙述母题’作为中介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媒介,而是一种特殊的审美机制或者说就是某种审美的形式,是积淀了一定民间信仰信息的审美形式。”在这里作者提出了两个很有见地的观点,一是民间信仰是古典小说叙事的内核,而叙述母题虽为叙事的形式,但它是一种审美形式,其中蕴涵着中华民族文化的某种精神。正因为如此,作者结合小说将二者的关系作为第三部分进行论述,显得深刻而具体。

(二)建构了一个融通中外文化的叙述体系。作者阐明了三个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的问题。在论述中借鉴了西

方文化关于民俗的论述,对母题的探索则是善于将西方小说研究方法巧妙地运用到中国小说研究中来。信仰问题虽然是自古就有所谈论,但是,作者运用了社会文化学的观点与中国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民俗分析的方法对与小说有关的信仰进行了细致的论证与分析。为读者揭示了民间信仰与古典小说起源及其内在精神的关系。母题研究对“母题”理论进行了探索,对母题概念进行了详细论述,提出了“叙述母题”新概念。对母题的分析又将人们看来毫无逻辑关系的篇章用几种模式表达出来,令人耳目一新。

(三)综合论述中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力。从每一部分说来,都可以说是文化诸因素的综合研究,作者在论述中善于将各种因素考虑进去,并站在发展的高度对信仰的形成过程、母题理论的由来进行了严谨而周详的论述。相对与前两部分而言,第三部分是综合研究。在这一部分的研究中,作者的才智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将信仰与文化、母题与形式、小说研究理论与作品本身综合起来研究,收到了成效。可见综合研究的运用使该论著新意迭出,立论精警,不同凡响。(萧晓阳)